



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编

黄伟宗 主编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国南海 海洋文化论

谭元亨 敖叶湘琼 廖文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编

黄伟宗 主编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国南海
海洋文化论**

谭元亨 敖叶湘琼 廖文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 / 谭元亨, 敖叶湘琼, 廖文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3. 7

(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编/黄伟宗主编)

ISBN 978—7—5454—1952—8

I. ①中… II. ①谭…②敖…③廖… III. ①南海—文化史 IV. ①K29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2513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大道南新滘南路上涌南约大街 9 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1 插页
字数	289 000 字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54—1952—8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话说中国海洋》丛书编委会

主 任：林 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主 任：顾作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朱仲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王桂科（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

于志刚（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

潘迎捷（上海海洋大学校长）

何 真（广东海洋大学校长）

徐根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

张召忠（国防大学教授、博导，海军少将）

张 僊（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所长）

编 委

王殿昌（国家海洋局规划司司长）

吕彩霞（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司长）

朱坚真（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

张海文（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所副所长）

郑伟仪（广东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李立新（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

吴 壮（农业部南海渔政局局长）

杜传贵（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倪 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

刘启宇（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发改办主任）

何祖敏（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华军（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

封金章（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
陈 勇（大连海洋大学副校长）
何建国（中山大学海洋学院院长）
金庆焕（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 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沈文周（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黄伟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向晓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庄国土（厦门大学南洋学院院长、教授）
李金明（厦门大学南洋学院教授）
柳和勇（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齐雨藻（暨南大学水生物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小平（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陈清潮（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何起祥（国土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原所长）
莫 杰（国土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秦 颖（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总监）
姚丹林（广东经济出版社社长）

Zong Xu 总序

林 雄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的辞典中，就不乏“海国”一词。华夏民族，并不从一开始就是闭关锁国的，而是有着大海一般宽阔的胸怀。正是大海，一直激发着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部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后人壮怀激烈，意气风发。

金轮乍涌三更日，宝气遥腾百粤山。

影聚帆樯通累译，祥开海国放欢颜。

古人寥寥几行诗，便把广东遍被海洋文明之华泽，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广东起锚，不仅令广东无负“天子南库”之盛名，更留下千古传诵的“珠还合浦”等众多的神话传说。而指南针的发明，造船业的兴盛，尤其是航海牵星术，更令中国之为海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声望。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南汉的“笼海得法”、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充分显示了我们作为海洋大国的强势地位。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创造了古代对外贸易、和平外交的出色典范。尽管自元代开始，有了禁海的反复，但明清“十三行”，在推动开海贸易上功不可没，并带来了大航海时代先进的人文与科学思潮，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作出长期的铺垫，成为两千多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彩乐段。新中国的广交会，可以说是“十三行”的延续，为打破列强的海上封锁，更为今日走向全面的对外开放，功高至伟。改革开放之初，以粤商为主体的国际华商，成为中国来自海外投资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份额。这也证实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国力强弱在海不在陆。海权优胜，则国力优胜。他的海洋实力计划，更在《建国方略》中一一加以阐述。进入21世纪，中国制定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

为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海洋强则国家强，海业兴则民族兴。曾经有着辉煌的海洋文明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强盛，历史之进步，无不与海洋相关。今日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包含了当日海洋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的成果。在经济腾飞的今天，文化在综合竞争力中的地位已日益突出。而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海洋文化，更早早显示出其强劲的势头。当我们致力于提高文化的创新力、辐射力、影响力与形象力之际，更应当从海洋文化中吸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活力源泉。

为此，我们出版《话说中国海洋》丛书，给海洋文化建设添加一汪活水，为推动广东乃至全国的海洋经济建设，使我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发挥一份力量。丛书亦可进一步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让国民认识海洋，了解海洋，普及海洋知识，激发开发海洋、维护海权的热情。这在当前，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历经千年不息的海上丝路，来往的何止是数不胜数的宝舶，奔腾而来的更是始终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海洋文化。灿烂的东方海洋文化走到今天，当有更辉煌的乐章，从展开部推向高潮部，愈加丰富多彩，愈加激动人心。《话说中国海洋》丛书的出版，当为这一高潮部增色，令高亢、激越的乐曲久久回荡在无边的的大海之上，永不止歇！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

——《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引论

黄伟宗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同仁，在完成“中国珠江文化史”课题之后，即请缨向“中国南海文化研究”的课题进军，主要缘由在于两点：一是纵深发展的感悟，即在历时多年的珠江文化研究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要真正地把握珠江文化的特质和古今发展走向，必须再向前走一步，持续研究珠江文化与中国南海以至与世界海洋文化的关系；二是当今时代的感悟，即海洋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和焦点，越来越受到举世关注，尤其是近年中国南海主权及开发之争白热化，掀起了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军事上的纷争波澜，从而也必然链接于史地和文化上的来龙去脉及其风风雨雨。

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21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人类开发海洋的时代正式开始，发展海洋的高潮正在滚滚而来。在这个背景下，世界临海国家纷纷制定海洋开发战略目标，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实施发展海洋经济的对策和措施。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更不甘人后。2002年11月，“实施海洋开发”被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5月，国务院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2009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提出了构建“蓝色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拉开了新世纪我国发展蓝色经济的历史帷幕，为我国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2010年，国家启动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把鲁、浙、粤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地区，以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陆海统筹发展的步伐。目前，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沿海地区“3+N”的经济区发展布局业已形成，沿海各省区闻风而动，纷纷提出、制定开发海洋、振兴海洋的战略或口号，形成

向海洋进军的时代潮流。从来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更不会甘于落后，早在2008年3月，在京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新到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同志，亲自到国家海洋局表示：“广东是海洋大省，海岸线比较长，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一定认真落实好国家海洋局对广东海洋工作的要求，努力争当全国海洋工作和海洋经济工作的排头兵，在全国带个好头。”（见2008年3月14日《中国海洋报》）这个表态，显然是出自世界海洋文化意识的真知灼见，尤其重要的是：首次为“广东是海洋大省”作出了明确的定位。随后即制定了一系列规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支持本科研项目在内），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研、文化等各项事业。

一、珠江文化的海洋性

笔者曾在多部关于珠江文化的论著中，以三首古诗形象譬喻中国三大江河文化的不同风格：黄河文化有似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江文化恰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珠江文化则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明珠江文化有特强特重的海洋性，也即是说，在珠江文化中有特强特重的海洋文化因素，海洋文化对珠江文化有特强特重的影响。

海洋文化，是指人类从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受制海洋而又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沿海的人群由于承受海洋的广阔、宽宏、运动、潮汐、风暴、狂飙、风险、深厚、神秘、丰富、灵变、流通等特性，而衍生的人文特性与精神，以及由此而体现在人的思维活动和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而产生的行为准则及方式。由于珠江流域位于南海北岸，海岸线长，江河出海口多，江海一体，所以自古至今都有特深特厚的传统海洋文化。

中外文化学者都认为：自然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文化特性有很大关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群所构成的人文环境，更是造就人的文化特性的直接孵化温床。所以，一定水域或地域的文化特性，总是由一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合铸而成的，又是随其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发

展变化缓慢，人文环境发展变化相对快些，对文化特性影响更直接些，但也须相当长的历史积淀才能显出发展变化之痕迹，所以，形成的文化特性有较长的历史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珠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珠江人共有的文化特性，即珠江文化特性。但在这水系流域中，各地带的文化特性也是千差万别的，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就珠江水系汇集的轴心地带（广东）的文化特性进行分析，其受海洋文化影响特别明显，以至使其特性都具有特强的海洋性，或者说都具有因海洋性而衍生的特性。如：

（一）宽宏性、共时性、领潮性

珠江流域濒临南海，有特长的海岸线，有多个江河出海口，又有悠久的海洋文化史。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与环境中的人群，必然是海洋性特强的。张九龄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形象生动地概括了珠江文化有大海似的宽宏风格与特质，点出了宽宏性、共时性、领潮性的文化特性。自16世纪后，世界进入了海洋时代，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主导着世界潮流。珠江流域的近海优势，使其最早得“明月”，最快得“共时”，最敏捷地迎海潮而“领潮”。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广东之在中国“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正是指广东文化的海洋性、共时性、领潮性特强之意。历来称广东人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近年尤其强调“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是广东人精神，就是这三种链接特性的活灵活现。

（二）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

珠江是由多条江河构成的水系，在珠江流域地带尚有许多其他江河纵横。这样的自然环境，与其多民族、多民系人群在其间交错聚居的人文环境和谐一致，同是多元一体的结构组合，从而也即形成珠江文化具有特别鲜明的多元性、包容性。从珠江水系总体上看，是以西江、北江、东江汇流珠江三角洲轴心的扇形结构。这结构，既是由轴心而多“龙”会“珠”的多元、包容形象，又是以轴心为“珠”而“珠光四射”的形象，即可谓开放的形象。可见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与其开放性，是有机链接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改革开放后更是鲜明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办特区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尤其

是珠江流域的企业、资金、劳力，似多龙会聚，涌向广东；特区所引进的港澳和海外的观念、体制、经济、文化，又似万丈光芒，辐射内地，不正是这种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的充分写照么？这种特性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洋性缩影。

（三）重商性、务实性、时效性

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还突出地体现在其重商性，因为海洋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商贸交往，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商贸之路。广东海岸线长，港口多、历史久、路线长，省内外贸易历来发达。所以，广东有悠久的商贸文化传统，珠江文化有特强的重商性。商贸是务实的，从而重实践、实用、实惠、实利；商贸的生命在商机，从而重时机、效率、效果，也即讲究时效，因而重商性与务实性、时效性密切关联。当然，广东人的务实性、时效性不仅在于商界，而是各界普遍的风格。改革开放后尤其普遍，深圳蛇口最早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口号，可谓一语道破了珠江文化重商性、务实性、时效性三位一体的天机。

（四）敏感性、变通性、机缘性

从堪輿学的眼光来看，江河为龙，龙头不是在江河发源地，而是在其出海或与其他江河交汇处，龙口在出海口或河口。珠江在南海有八个门（即出海口），也即是龙口。八个龙口汲取海洋精华，既多且近地得风气之先，故有先天的敏感性，也即灵活性。海洋气候多变，近水使人灵，江海环境也会孕育人的灵活善变，即有变通性。广东人被称为“精仔”，就在于有突出的敏感性和变通性。改革开放中，所谓“饮头啖汤”“用足政策”，以及“红灯绕道走、绿灯快速走、黄灯抢前走”等说法，更是这种特性的普及版本。与此关联的机缘性，源于商贸所需的公关，根自传统的观念和关系网，亲朋好友、“死党”老乡，固是情分机缘、偶然接触、初次交往，也是难得机遇，皆可灵变借此机缘，将事办好办成。所谓“随机应变”“机动灵活”“机不可失”“转危为机”等词语之“机”，皆时机、机会、机遇、机缘等意也，每个词语都是敏感性、变通性、机缘性的密切关联并连锁反应之生动体现。

（五）移民性、开拓性、适应性

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流域，移民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多。华侨华人文化与侨乡文化，实质上属移民文化。从中国向海外移民，是海洋文化移民性、开拓性、适应性的体现，因海外移民漂洋过海，创业谋生，而且很快能适应异国生存，并代代相传，根深叶茂。广东向外国的移民，有悠久的历史，从而也就形成这种传统文化。从现有史料看，在16世纪中叶，即明代中叶开始，从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向东南亚、美洲的移民逐年增多，这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吸收外来劳力有密切关系。就中国来说，从有关南雄珠玑巷南迁移民的史料可见，以罗贵为首的一批南宋时期的南下移民，在江门蓬江区良溪村一带立足，开发珠江三角洲一段时间之后，其后裔即向海外发展。所以，良溪是中原移民南下后又向海外开拓的中转站，故可称其为“后珠玑巷”。迄今广东省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有许多华人华侨后裔，也证实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另据美国华人学者编著的华工史料称：大批“四邑”华工是在美国修建东西铁路时远涉大洋赴美的，所以现在美国旧金山市华人多是“四邑”人，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四邑”则是最古老的侨乡，具有最深厚的传统华侨华人文化与侨乡文化。前不久，以中西合璧建筑为特色的开平碉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对华人华侨文化与侨乡文化是珠江文化特有的传统文化的有力肯定，也是珠江文化海洋性特质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后，又有大批从广东出境的新华人华侨，其中有许多在海外深造后又回国服务的“海归”派，以及许多在中国与外国轮流居住的“双侨民”（既是华侨，又是有护照国之“侨”），使华侨华人文化和侨乡文化增添了许多新方式、新地域、新内涵、新色彩，更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性持续发展的勃勃生机。

（六）平民性、平等性、自在性

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六祖惠能《坛经》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人人心中有佛”，“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可谓全面体现平民、平等、自在的思想，毛泽东称赞他将印度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是老百姓的佛教。这是珠江文化具有平民性（也即大众性）、平等

性、自在性的最早体现和理论。平民性和平等性，也即造就个性，个性化即自在性，所以这三者也是连锁反应的特性。这些特性，是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重商性衍生出来的，所谓“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公正、公平、公开”等口号，都是这些特性的现代版本，流行歌曲《潇洒走一回》更将这三位一体之特性唱透唱红，传遍神州大地！

二、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历史发展时期

珠江文化的海洋性是不断发展的。从史前到现在的数千年历史，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百越族时期，或称自然生态时期，亦称“海上明月”时期。

在秦始皇统一南粤之前，广东是百越族生息之地。《汉书·地理志》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多有种姓。”现已证实，百越族是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栖居的海上民族，在广东的称南越。有史料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又称：越人“识水，善舟”，“食海中鱼”，“不畏风雨禽兽”。人多文身，刺龙图样，以求在水中为其护佑。居住的是杆栏式屋，离地有空层，以防蛇虫袭蚀。前些年在珠海市沙丘先秦时代遗址中，发现有房址、墓葬、制造石器陶器的遗存，尤其是古越人捕鱼的石锚、宝镜湾上的岩画，以及在香港、深圳等地的考古发现等等，均说明珠江三角洲在新石器时代有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区，并可能是连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南岛语系族群。此外，在西江河畔高要市金利镇茅岗村，尚存有水上结构建筑遗址，在发现的文物中，除陶、木、竹器和人兽遗骸之外，还发现一批渔猎工具和一堵由贝、蚌、蚝堆积而成的层墙，现已证实是3000年前先秦时期水上居民遗址，是广东近江河最大一处水上木结构建筑遗址。由此可见，从南海边到内江河都是古越人的栖息地，百越族时期的广东先民尚处在以海为生的状态中，海是他们生存的条件和希望，所以，百越族时期是自然生态时期，是海洋文化在广东的萌生期，亦可称之为“海上明月”时期。

第二，古代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亦称“海上敦煌”时期。

秦始皇统一南粤后，广东进入了古代时期。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玛瑙、翡翠等海外珍宝，说明秦代的广东已有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和交往。而我们从《汉书·地理志》中，查找到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黄门驿长由徐闻、合浦从海上赴日南（今越南中部）等地的记载。我们多次到现场考察，并经学术论证，确实徐闻是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提前1300多年。从而确定海上丝绸之路与以西安为标志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时间大致相同，并且由此找到了海洋文化在广东最早的史书记载和历史遗址，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上交通与海外各国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之路，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丝绸、青铜、瓷器都是由此途径传播世界的。我们还在南海从东到西的重要港口（包括：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珠海、台山、阳江、电白、湛江、遂溪、雷州、徐闻、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查到从汉代至清代的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古港，而且发现这些古港在历史上往往是此盛彼衰的，又因此而构成了一部较完整的近三千年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从而证实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早、年代最齐、港口最多、线路最长的古代海洋文化大省。尤其是在阳江发现的南海I号宋代沉船，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确定，是迄今海上考古发现文物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四最”文物，初步估计船上拥有文物5万~8万件，比拥有5万件文物的、作为陆上丝绸之路标志的甘肃敦煌还多，由此我们于2003年前往考察时，为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从上可见，广东自秦汉以来的海洋文化遗存是极其悠久、丰富、全面、珍贵的，所体现的广东古代海洋文化是极其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这时尤为辉煌，所以称这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南海I号更是其辉煌之最。所以，也可以将其文化定位为这一时期的广东海洋文化的代号，称为“海上敦煌”时期。

第三，近代时期，是东西学互渐时期，亦称“海洋文明”时期。

中国著名文化大师季羨林教授说：“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季教授所指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即是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从澳门进入广东，

并逐步在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从而掀起了后来被中国首位留美博士容闳(珠海人)称之为“西学东渐”的文化热潮;又由于这些传教士同时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东学(或中学)西渐”热潮,从而对应地并称为“东西学互渐”文化热潮。这个热潮,从16世纪至19世纪,持续三百多年之久。这时期,西方海洋文化从澳门进入肇庆,沿西江传遍广东,再北上内地、遍及大陆,而中国文化也从广东传入西方,是中西方文化大交流时期。在这个时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广东传进了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第一座自鸣钟、第一部汉葡词典,引进了西方数学、天文学、历学、医药学、物理学、水利学等等,从而在广东涌现了许多在全国领先的文化,如教堂、西医院、图书馆、报纸等的“第一家”都是在广东出现的。尤其是以容闳为代表的清末“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倡导并督办向西方派儿童留学生等活动,更使西方海洋文明大量传入,使广东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所以,这个近代时期,是东西学互渐时期,亦可称“海洋文明”时期。

第四,现代时期,亦称“现代海洋文化”时期。

此前三个时期与现代海洋文化时期的最大区别,就是:对于海洋文化,前者是自发性的,后者则是逐步自觉的。这个时期先后有三个浪潮层层迭进,可以说是从自发逐步转化为自觉的过程。我们当今正处在第三个浪潮的启端,应当更自觉地去完成这个过程,在过去自发辉煌的基础上,再创造自觉性的新辉煌。

这个时期,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开始的,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一切都有了新的发端。而且,这发端一直持续发展,迄今仅30余年,即持续不断地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并呈现出方兴未艾、前景无限的发展势头。

从现代文化学的眼光来看,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实质上是世界海洋文化浪潮在广东及珠江流域掀起的历程。在这期间,可以说一直风生水起,波澜不断,而具有跨越龙门性质的大浪潮,则只有三次:

第一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的浪潮。这次大浪潮的主要标志,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和海南等沿海城市为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这策略本身即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意识和

内涵。因为这些城市在南海之滨，自古是广东以至中国对外交往的桥头堡，且毗邻港澳，与海外交往便捷。这次浪潮的启端是从“三来一补”“借鸡下蛋”，到承包或独资经营等方式，大量引进港澳和海外投资，引进外资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尤其是在体制上肯定和采取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观念和做法，对于原有的计划经济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这些观念和做法，就是引入海洋经济而发生的，同时也即是海洋文化所产生的成果。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海洋文化，是指人类从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受制海洋而又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沿海的人群由于承受海洋的广阔、宽宏、运动、潮汐、风暴、狂飙、风险、深厚、神秘、丰富、灵变、流通等特性，而衍生的人文特性与精神，以及由此而体现在人的思维活动和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而产生的行为准则及方式。从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效果上来看，“敢为天下先”，“杀出一条血路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正是海洋文化意识和精神的典型体现；引入外资和市场经济，则可谓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接受了海洋经济同时也即是海洋文化的实质与行为。而在文化上提出“排污不排外”的口号，以及直接从西方搬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名言作为“特区精神”，更是海洋文化在广东的实质原版。

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纪初开始的浪潮。这次浪潮的主要标志，是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的崛起和泛珠三角合作区域的形成。这次浪潮，意味着世界海洋经济与文化在特区登陆之后，从珠江口进一步扩展，在珠三角形成了新的海洋经济城市群，同时也是海洋文化城市群。接着又在中央提出建设三个沿海经济圈（即环渤海湾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背景下，从珠三角发展为粤港澳构建的“大珠三角”，进而扩展为“泛珠三角”（包括珠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即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四川，以及香港、澳门，即“9+2”）。这次浪潮，显然标志着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延伸内陆以至全国，同时又标志着海洋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江河文化、山地文化，开始了从对撞到结合之势。因为泛珠三角合作区域的构成，本身就体现了从江海一体到山海相通的结合，而以中国三条主干大河的出海三角洲而建设经济圈的战略举措，显然是既有这种文化结合的内涵，又具有以出海口引入海洋文化，润化三江流域，并向全国辐射的意义。

从现代文化学的意义上说,这次浪潮的特点在于:以当今世界的大文化理念和自觉的文化意识,冲击和取代沉积多年的狭隘地域观念和浅小的文化观念;并以水域文化为纽带,引入并扩展海洋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区域的交流与合作;自觉的文化意识指导决策,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谐广东等口号,也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理念的新体现和再创造。

第三次浪潮,是于2008年掀起的浪潮。这次浪潮的主要标志是: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带动新一轮大发展,以世界眼光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个浪潮,如今正处在拉开序幕的阶段,但其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性质也初显端倪了。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第六次海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海洋事业大发展,是广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重新认识海洋,切实增强加快海洋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区、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广东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将“建设海洋经济综合开发试验区”单列成章,提出“率先基本建成海洋强省,争当全国海洋事业科学发展排头兵”的目标。同时,《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试验区发展规划》原则上已获国务院批复,这标志着广东将进入全新的海洋时代。“向海洋要资源,要环境,要空间”成为广东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沿海经济带将成为与珠三角并行的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撬动板。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南海开发和“三生共融”的综合发展上。以南海海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带动海洋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把广东引向“海洋时代”。“三生共融”即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的全方位统筹综合开发,实践海洋的科学发展。在经济战略上,最典型的是现在刚开始进行的珠江三角洲生产“双转移”(工业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的重大举措。其具体做法是:让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企业向广东内地和山区转移。这样做,一方面是使珠三角发达地区腾出空间,以便引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是使欠发达地区有了新的企业引进,使全省形成梯形的发展格局和生产转型。这项举措的核心,是以世界高科技企业的引进和更新为红线,串联珠三角与内地的互动关系,使经济既突出重点又带动弱点的梯形增长。从文化眼光看来,这项举措是要使最得益海洋文化的珠三角,在向内地转移虽然稍旧但未过时的企业之后,既以此而将海洋文化延伸内陆,同